治理绩效

乡村振兴赋能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

——基于可行能力视角

康 慧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经济学院，晋中 030619）

摘要：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明晰乡村振兴政策如何与农村居民能力培育实现有效衔接，探讨农村居民客观可行能力对其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并在山西省农村居民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中经济条件（家庭人均收入）、生态宜居条件（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农村基础设施）、政治参与能力及身体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乡风文明条件（邻里氛围）与防护性保障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并无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影响。社会机会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通过构建本土化的可行能力指标体系，为理解乡村振兴的福祉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证依据。三农政策应切实扩展农村居民的选择自由，使乡村振兴的成果真正转化为他们可衡量、可感知的生活改善。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生活满意度；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0－0229－08

在当前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观背景下，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核心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凸显了农村居民福祉增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战略意义。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丰裕，更是包括环境宜居、精神富足在内的全方位发展，要求农村居民在新时代享有更高质量的民生保障。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抓手，为破解农村发展瓶颈提供了系统性路径。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围绕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多维度探讨，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层面[2-4]。近年来，制度性保障的影响受到重视，例如，蔡少伦[5]关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陈华帅等[6]探讨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路径；朱楠和李萌[7]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角度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可见，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促进乡村社会繁荣，实现“产业振兴、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深入探索造成提升障碍的深层次因素，是值得研究的方向。

在共同富裕的愿景与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下，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确认。但既有文献多聚焦于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等单一或特定维度的影响，这些研究虽有意义，却未能提供一个系统性的从根本上回答困扰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提升本质原因的框架。20世纪八九十年代，Sen[8]提出的可行能力理论，把“可行能力”定义为“能让一个人实现各种生活方式或过上高质量生活的能力”，包括吃、住、行、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功能性活动。这为农村居民社会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点。农村居民增收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被认为是其收入处于较低水平，生活质量低下的深层原因。农村居民面临可行能力的剥夺与缺失，既表现为拥有的个人资源禀赋贫瘠，也表现为缺乏足够的外部社会机制支持。城乡在就业环境、子女教育、医疗资源保障、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及农村居民自我发展的路径依赖造成其可行能力贫困。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越弱，其生活质量低下的概率就越高；可行能力越强，生活质量提升的时间就越短，同时农村社会也会因农民可

收稿日期：2025-12-18

基金项目：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20年重点课题（SSKLZDKT2020185）

作者简介：康慧（1980—），女，山西保德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制度理论。

行能力的提升而不断进步。在乡村振兴的制度型公共产品框架下切入可行能力视角，也有利于明晰乡村振兴政策如何更好地与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培育相结合，在国家宏观战略与居民微观福祉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结，揭示“乡村发展”如何通过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拓展，实现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的提升。Sen[8]的可行能力理论强调根据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界定和测量那些关键的可行能力维度。基于此，本文将其置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背景下，尝试构建一个连接宏观战略目标与个体体验的“可行能力-生活满意度”分析框架，来回答乡村振兴实践如何培育与扩展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并转化为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1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1.1 可行能力-生活满意度分析框架

Veenhoven[9]认为生活质量是个体在相应生活机会下的生活结果的反映，生活机会是指个人追求品质生活的机会，更倾向于生活质量的客观描述；生活结果是生活机会带来的可能性的实现，更多地体现生活质量的主观层面。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低下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可行能力水平不高、发展受限在精神层面的表现，因为生活满意度也取决于“某个人实际能够做什么或处于什么状态”，即可行能力的集合。阿马蒂亚·森[10]的可行能力理论提供了研究客观生活条件到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强有力分析工具。无论什么样的发展机制，其终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民构建未来的能力。农村居民可行能力是指农村居民实现各种有价值功能的实际能力，对自己生活方式选择的能力，即有权享受和可实现的生活、医疗、社会参与等多维度的权益集合。阿马蒂亚·森[10]的理论提出了5种衡量福利的功能性活动，即经济条件、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社会机会以及政治自由。Brock[11]继承森的关注实质机会的思想并拓展了制度责任的宏观视野；Nussbaum[12]提出十项核心能力清单，为可行能力指标体系构建提供了操作性框架。他们认为可行能力的内容应随研究对象及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调整。近年来，沈珺[13]关注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构建；宋瑛等[14]侧重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福利的促进作用；彭新万和张承[15]研究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治理；刘波[16]聚焦可行能力差距分解；张方华和陈蔓竹[17]讨论了国家能力与个人可行能力的平衡。学者的研究各有千秋，都在推动可行能力理论的实践应用，但没有构建一个适用于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助推生活满意度提升的理论框架。因此，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紧扣时代发展背景，创造性地融合了“可行能力”内核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力图使理论维度与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战略目标相衔接。同时突破现有研究重经济条件轻发展型维度的掣肘，将“生态宜居条件”与“乡风文明条件”纳入，形成了包含经济条件、生态宜居条件、乡风文明条件、政治参与能力、防护性保障、健康状况与社会机会7个核心维度的测量体系。指标的具体解构如下。

(1)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个体的生活质量应由他的自由来衡量[10]。Brandolini[18]指出，以收入获取能力为主导的经济因素是判断一个人实现自由的关键指标和功能性活动，对构成可行能力的其他活动的实现有着重要影响。山西省整体GDP水平处于中下游，广大农村经济较为落后。农村居民家庭经济条件是约束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乡村振兴首要的目标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并帮助农村居民摆脱经济贫困，这无疑是提升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现实基础和条件。袁方和史清华[19]认为因收入的相对剥夺而导致的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是农民贫困的关键。农村产业弱化极大地减少了农村居民创造收入的机会与可能，同时农村产业发展状况会影响收入分配格局，涉及农村居民在当地从事的行业和选择工作的自由。基于此，选择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人均支出、家庭收入主要获取地及来源、村镇主导产业类型为经济条件量化指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认为经济条件仍然是决定与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非常重要的因素，并形成如下假设。

H1：经济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2)生态宜居条件。通过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农民的生态安全得到满足，生态幸福获得保障，这正是提升农村居民可行能力需要特别重视的内容。随着农村居民整体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优良生活环境的需求也在上升，农村居民不再满足于有房可居，所居住区域的生活环境也成为影响其工作生活选择的重要因素，同时成为乡村对外来人才保持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选择住房条件、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空气质量、噪声状况、自然环境满意度、基础设施满意度为生态宜居条件的主要指

标。并基于文献梳理提出如下假设。

H2：农村生态宜居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3)乡村文明条件。乡风潜移默化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作为软件基础，为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农村的教育情况、文化娱乐活动、人际交往、邻里氛围等都能反映农村的乡风文明状态。这些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的可行能力的必要条件。Nussbaum[12]提出的人类发展基本能力清单中包括能够与他人共同生存、生活，意识到并关心他人的存在的友好关系。Brock[11]的可行能力清单提到的是“得体的社会关系”。人的群居性决定了所居住的人文环境也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许多农村居民不愿意留在城市陪伴孩子而选择回到农村去独自生活，有部分原因是老家乡亲形成的社会交往圈。结合乡风文明建设，选择村里教育水平、对村里文化活动满意度、经常走动的亲戚邻居数、邻里氛围等指标，并基于文献梳理提出如下假设。

H3：乡风文明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4)政治参与能力。在乡村治理方面，要求保障每一个村民享有政治自由、民主权利与政策保障等，这恰恰体现的是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中的“政治参与能力”。政府提供的最基本公共品即乡村治理水平。作为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农村居民自我意志表达、政治参与能力是其生活满意度的构成要素。武颖[20]认为，政治参与通过自信心、胜任力对农村青年的幸福感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此，选择政府效率、一事一议制度参与程度、对乡村干部廉政的满意度作为二级指标。并形成如下假设。

H4：政治参与能力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5)防护性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导致许多农村居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失去传统的防护性保障，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降低。政府积极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是旨在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提升农村居民基础保障水平。张子豪和谭燕芝[21]认为社会保险的全面性会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向运华和姚虹[22]利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得出，有新农合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而由于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有限，其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明显。蔡少伦[5]得出城乡居保对60岁以上进入领取期的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影响显著。综合考虑，选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认缴档次作为衡量农村居民防护性保障功能性活动的指标。并提出如下假设。

H5：农村居民防护性保障对其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6)健康状况。健康对于个体可行能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而身体健康状态是农村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中正常活动和能力扩展的前提。李静和王月金[23]认为农民的身体、心理健康状况与其主观福祉高度相关。张宇争等[24]论证了健康是社会资本促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中介变量。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6：本人及家人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7)社会机会。根据阿马蒂亚·森[10]做出的界定，社会机会是每个个体平等地拥有享受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有效参与经济与政治活动，实现自身价值与追求的机会。农村居民因为缺乏知识技能造成可行能力不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所受教育的不足。接受同等教育是起点公平最重要的因素，受教育水平对一个人选择机会的影响很大。魏晓艳[25]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选择“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机会的指标，并提出如下假设。

H7：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1.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1年11—12月由课程组开展的实地调研。基于团队持续10年的山西省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追踪调查所积累的经验，调查设计按多阶段分层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原则，在山西省抽取包括太原、大同等11个地区，以保证样本在总体上对山西省农村居民具有代表性。具体由各地市联络员依据乡村类型随机抽取4～7个行政村，在最终确定的69个样本村内，采用随机起点等距抽样法抽取10户家庭，以确保样本类型的多样性。样本量的确定综合考量了科学性与可行性，兼顾农村地区实地调研的实操性与成本效益的平衡。依据社会调查样本量计算公式，选择95%的置信水平、允许误差放宽至$E=\pm5\%$，最低样本量为384份，实际发放问卷690份，回收有效问卷660份，有效回收

率为95.65%。为评估横截面调查的样本选择偏误，将样本关键变量家庭人均收入分布与《山西省统计年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值进行比对，其梯度结构与分布基本吻合，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样本在经济维度上的代表性。核心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以问题“如果让你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话，您会选择打几分?”度量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问卷中按1～10分打分，分析中以两分为一档归并为5个等级，赋值从低到高分别为1～5。由表1可知，山西省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值为3.62，大致介于“一般满意”与“比较满意”之间。

解释变量分为七类，分别是经济条件、生态宜居条件、乡风文明状态、政治参与能力、防护性保障、健康状况、社会机会七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变量分组及样本统计特征值如表1所示。

控制变量。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使农村居民即使拥有相同的物质组合，其可行能力也存在差异，相关文献研究证明这些个体特征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原因。为尽可能消除由于变量遗漏而给模型估计造成的误差，还控制了年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态。

2　实证分析与检验

2.1　山西省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分析

将个人基本特征、经济条件、生态宜居条件、乡风文明条件、政治参与能力、防护性保障、健康状况、社会机会等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利用卡方检验显著性，删除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相关性不显著的几个变量，保留了家庭人均收入、人均支出、住房条件、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空气质量、噪声状

表1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说明与赋值	均值	标准差
生活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满意;4=较满意;5=很满意	3.62	0.78
经济条件	家庭人均收入	1=0.5万元以下;2=0.5万～1万元;3=1万～2万元;4=2万～3万元;5=3万～4万元;6=4万元以上	2.58	0.96
	家庭人均支出	1=0.5万元以下;2=0.5万～1万元;3=1万～2万元;4=2万元以上	2.14	0.98
	收入主要获取地及来源	1=本乡村农产品销售收入;2=本乡村企业工作所得收入;3=本乡村出租固定资产收入;4=本乡村做买卖获取收入;5=城镇外出打工工资收入;6=子女或储蓄;7=低保养老金等政府行为	2.89	1.01
	村镇主导产业类型	1=非农产业带动型; 2=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型; 3=农业旅游业带动型; 4=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型;5=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	2.59	1.67
生态宜居条件	住房条件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较差;5=很差	3.05	0.91
	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	1=正向（如收入增加等);2=负向(环境破坏)	1.37	0.48
	空气质量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差;4=较差;5=很差	3.13	0.97
	噪声状况	1=噪声污染很大;2=噪声污染比较大;3=噪声污染一般;4=噪声污染较小;5=噪声污染很小	3.18	0.91
	对村里自然环境的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满意;4=较满意;5=很满意	3.20	0.91
	对村里基础设施的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满意;4=较满意;5=很满意	2.92	0.96
乡风文明条件	村里的教育情况	1=只有幼儿园;2=有幼儿园与小学; 3=有幼儿园与小学、初中; 4=有幼儿园与小学、初中、高中	1.95	0.94
	对村里教育质量的评价	1=很差;2=差;3=一般;4=可以;5=优质	2.56	0.98
	对村里文化活动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满意;4=较满意;5=很满意	2.77	0.93
	经常走动的亲戚邻居数	1=没有;2=1～2家;3=3～4家;4=4家以上	2.41	0.90
	邻里氛围	1=非常不和睦;2=比较不和睦;3=一般;4=较和睦;5=很和睦	3.78	0.74
政治参与能力	政府效率	1=很慢; 2=较慢; 3=一般;4=较快;5=非常快	2.94	0.92
	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情况	1=不能自由参与;2=可以自由参与	1.47	0.50
	对乡村干部廉政的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满意;4=较满意;5=很满意	2.95	1.00
防护性保障	认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况	1=认缴最低档;2=认缴中间档;3=认缴最高档	1.96	0.37
自己与家人身体健康状况	本人身体健康程度	1=有疾病困扰;2=次健康;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	2.94	0.77
	家人身体健康程度	1=有疾病困扰;2=次健康;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	2.57	0.96
社会机会	受教育程度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职高;4=大专及以上	2.76	1.08
农村居民个体特征	性别	1=男;2=女	1.51	0.50
	年龄	1=29岁及以下;2=30～44岁;3=45～59岁;4=60岁及以上	2.01	0.98
	婚姻状况	1=已婚; 2=未婚(包括丧偶、离婚)	1.38	0.49
	居住地情况	1=乡村; 2=县城;3=城市	1.40	0.62

况、村里自然环境的满意度、村里基础设施的满意度、村里教育情况、对村里文化活动满意度、经常走动的亲戚邻居数、邻里氛围、政府效率、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对乡村干部廉政的满意度、本人身体健康状况、居住地，这些因素的 χ^2 检验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2.2　山西省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2.2.1　模型估计

采用逐步回归法对进入模型的自变量进行筛选，最终留下经济条件（人均收入）、生态宜居条件（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对村里基础设施的满意度）、乡风文明条件（邻里氛围）、政治参与能力（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及本人身体健康这 6 个自变量。变量的 VIF 最大为 1.159，小于 10，说明多重共线性不明显，满足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的假设之一。最后以这 6 个自变量构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多元有序回归模型（表 2），从输出结果来看，模型的 P 为 0.997，大于 0.05，通过平行线检验。模型计算公式为

$$\ln\frac{p(Y\leqslant j)}{1-p(Y\leqslant j)}=\alpha+\beta_1x_1+\beta_2x_2+\cdots+\beta_6x_6+\mu \quad (1)$$

式中：解释变量取值为 $X_i(i=1,2,\cdots,6)$，X_1 为经济条件中的人均收入，…，X_6 为农村居民身体健康状况；被解释变量用 Y_j 表示，$j=1,2,\cdots,5$，代表 5 个等级；α 为截距项；β 为回归系数；μ 为随机项。分类变量以最后一类为参照类，如人均收入以“4 万元以上”为参照类。

2.2.2　模型结果分析

经济条件中的家庭人均收入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从统计结论看，相比于参照组人均收入为“4 万元以上”的农村居民，其他各组的 Exp(B)都小于 1，即家庭人均收入低的农村居民相比人均收入高的农村居民认为生活非常满意的概率要低。具体来看，相对于参照组人均收入为“4 万元以上”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0.5 万元以下”的农村居民认为生活非常满意的发生概率为 0.23 倍[Exp(B)=0.23]；同时人均收入在“3 万～4 万元”的农村居民与参照组“4 万元以上”的优势比接近 1，说明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差异不大，也侧面说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生活满意度更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 H1 相符。

生态宜居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与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那些对

表 2　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1

变量		变量赋值	B	Exp(B)	P	标准误
经济条件（人均收入）参照组：4 万元以上		0.5 万元以下	−1.457**	0.23	0.038	0.703
		0.5 万～1 万元	−0.701*	0.50	0.082	0.697
		1 万～2 万元	−0.419*	0.66	0.091	0.726
		2 万～3 万元	−0.36**	0.70	0.048	0.738
		3 万～4 万元	−0.089*	0.91	0.100	0.782
生态宜居条件	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参照组：负向（环境破坏）	正向（如收入增加等）	1.007***	2.74	0.001	0.304
	对村里基础设施的评价参照组：基础设施非常好	非常不好	−2.27***	0.11	0.004	0.799
		比较不好	−2.104***	0.12	0.004	0.725
		一般	−1.724***	0.18	0.009	0.663
		较好	−1.117*	0.33	0.103	0.704
乡风文明条件（邻里氛围）参照组：很和睦		非常不和睦				
		比较不和睦	−0.312	0.73	0.772	1.077
		一般	−0.834*	0.43	0.067	0.456
		较和睦	−0.169	0.84	0.685	0.417
政治参与能力（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参照组：可以自由参与		不能自由参与	−0.774***	0.46	0.007	0.289
本人身体健康状况参照组：非常健康		有疾病困扰	−0.963*	0.38	0.077	0.664
		次健康	−1.234***	0.29	0.001	0.481
		比较健康	−0.576*	0.56	0.084	0.362
模型拟合信息	对数似然值	379.828				
	P	0.000				
	Nagelkerke R^2	0.541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N=660。

村里产业开发持正向态度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评价更高的概率是持负向态度农村居民的2.74倍。农村居民“对村里基础设施的评价”与生活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对村里基础设施评价不好的农村居民较“对村里基础设施评价非常好”的农村居民Exp(*B*)在0.2以下。这说明，认为农村基础设施非常好的农村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更高，反之对农村基础设施评价不高的农村居民有更低的概率对其生活满意度打高分，与H2相符。

乡风文明条件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太显著。从回归结果看，那些邻里氛围感觉一般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评价更高的概率是邻里氛围很和睦农村居民的0.43倍(10%水平下)。但其他分类显示邻里氛围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H3没有很好地被验证。

良好乡村治理体系下农村居民政治参与能力与其生活满意度相关。评价农村居民政治参与能力的“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与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相比参照组“可以自由参与”，“不能自由参与”村镇一事一议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Exp(*B*)=0.46，说明能自由参与到村镇议事的农村居民对乡村治理的评价更高，显然，政治参与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与H4相符。

防护性保障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认缴档次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养老金兑现周期较长，考虑现行支付成本与未来收益，现在多缴带来的成本上升对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大于未来兑付的正向影响。基于目前养老保险提供的基础保障作用，农村居民获得感的提升还是很有限的，随着国家对农村居民基础社会保障的完善，农村居民较没有社会保障前在医疗支付、养老支付方面获得感更高，但还没有普遍上升到幸福感层面。激活农村居民的现有资源，更快更好地向经济效益转换，才能给予农村居民最大最稳定的获得感与安全感，进而上升为幸福感的提升。

农村居民个人身体健康状态对其生活满意度影响很大。以“非常健康”组的农村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为参照组，自评为“次健康”的农村居民相较于“非常健康”的农村居民组的Exp(B)为0.29，且在1%的统计水平下表现显著，表明身体状态为“次健康”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更高的概率是“身体非常健康”农村居民的0.29倍。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身体健康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更高，健康的身体是工作的原动力，分析结论符合H6。

社会机会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确定。教育能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社会机会，从而成为提升其可行能力的重要因素，在考察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样本研究结果($P=0.163$，卡方=12.191)卡方检验在5%的水平上不显著。所以没有进入模型(1)，基于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在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单因素交叉分析中，把P放宽到0.2，这样在模型(2)中(表3)，加入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变量呈现10%水平的显著性，Exp(*B*)为0.50，意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情况在小学以下的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生活满意度的机会比是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村居民的0.5倍，“高中及职高”分组的Exp(*B*)为2.04，在10%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有影响，

表3 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回归结果2

变量	变量赋值	模型(2)	
		Exp(*B*)	标准误
人均收入 参照组：4万元以上	0.5万元以下	0.28*	0.708
	0.5万～1万元	0.56*	0.701
	1万～2万元	0.71*	0.728
	2万～3万元	0.84**	0.740
	3万～4万元	0.98*	0.791
村里产业开发对生活的影响 参照组：负向(环境破坏)	正向 (如收入增加等)	2.98***	0.309
对村里基础设施的评价 参照组：基础设施非常好	非常不好	0.09***	0.810
	比较不好	0.11***	0.728
	一般	0.16***	0.668
	较好	0.27*	0.711
邻里氛围 参照组：很和睦	非常不和睦		
	比较不和睦	0.65	1.091
	一般	0.44*	0.460
	较和睦	0.95	0.422
对一事一议制度的参与程度 参照组：可以自由参与	不能自由参与	2.26***	0.293
本人身体健康状况 参照组：非常健康	有疾病困扰	0.51*	0.701
	次健康	0.36**	0.509
	健康	0.55*	0.366
社会机会(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0.50*	0.489
	初中	1.03	0.352
	高中及职高	2.04*	0.406
对数似然值	401.072		
P	0.000		
Nagelkerke R^2	0.567		
平行性检验	0.894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N*=660。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情况在“高中及职高”的农村居民具有更高生活满意度的机会比是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农村居民的2.04倍，其他分组的显著性没有通过检验。可能高中学历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的工作相对竞争压力小，比较对象也是本村居民，而在农村地区，高中的学历已然够用，因此这类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更高。

3　结论与启示

可行能力理论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农村居民生活质量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农民的生存、发展能力建设是乡村振兴的落脚点，乡村振兴应以提升农村居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为“内生力量”。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农村居民可行能力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村居民可行能力中的经济条件、生态宜居条件、政治参与能力和农村居民个人健康状况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更大。②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农村居民防护性保障的代理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其对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并未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现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及其配套的医疗保险，主要功能在于满足农村居民基础性的社会保障需求，使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普惠性待遇。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授人以鱼”式的物质转移，更需要“授人以渔”式的可行能力培育。单一的防护性保障在未转化为发展能力时，其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是有限的。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如何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福祉与安全感的防护性保障体系，仍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索的重要议题。③受教育程度作为社会机会这一可行能力的替代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教育虽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但是受教育程度并不是越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就越高。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工作机会越多，但对生活的期望及比较的对象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一结论符合预期。

上述结论对当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与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鉴于宏观层面的制度保障构成了微观层面农村居民生活选择集的重要约束条件，影响其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把关注的视角放到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方面。资源的有限性需要找到政策供给的优先级，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农村居民可行能力的增强依赖于针对乡村的多层政策匹配：①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农村居民就业面的角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经济条件，为农民留在农村、回流家乡提供土壤；②从促进农村宜居角度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多效并举丰富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③积极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提高农村居民主人翁意识与相关事务的参与度；④从制度供给角度助力农村居民健康权，协调农村地区公共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⑤虽然受教育程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定是正向的，但教育显然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可行能力，也是人才振兴的基石。所以政府依然需要在提升农村的基础教育层次与水平上努力，通过政府引导在农村公共教育资源上的分配，打破优质教育资源的城市集聚效应下所造成的农村教育资源不断流失的局面，保障农村教育体系的构建质量。总之，实现农村居民的共同富裕目标应以拓展可行能力为导向，将可行能力的提升寄托于农村居民与政府共同发力，既有赖于政府在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助力，也依托于农村居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政策环境和个体能力充分互动下，农村居民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选择权得以提升，继而获得主观上的幸福感。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胡荣华，陈琰. 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统计研究，2012(5)：79-83.

[3] 廖永松. “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2014(9)：4-16.

[4] 胡晨沛，朱玮强，顾蕾. 个人收入、家庭资产与农村居民幸福感[J]. 调研世界，2017(4)：41-49.

[5] 蔡少伦.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农村居民福祉的影响研究[D]. 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22.

[6] 陈华帅，马伟，张磊. 数字乡村发展能否提升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经济问题，2025(2)：165-181.

[7] 朱楠，李萌.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来自中国四省实地调查的实证分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4(1)：153-168.

[8] SEN A.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9] VEENHOVEN R. Rising happiness in nations 1946—

2004：a reply to Easterli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6，79(3)：421-436.
[10] 阿马蒂亚·森. 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赜，于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1] BROCK G. Global justice：a cosmopolitan account[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2] NUSSBAUM M C. Creating capabilities：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3] 沈珺.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农民工满意度研究——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分析[D]. 武汉：武汉大学，2017.
[14] 宋瑛，李璐，张驰.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福利水平——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视角[J]. 贵州社会科学，2024(12)：141-151.
[15] 彭新万，张承. 可行能力提升视域下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与治理路径[J]. 求实，2022(1)：68-80.
[16] 刘波. 共同富裕愿景下可行能力差距的测度与分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6(3)：73-78.
[17] 张方华，陈蔓竹. 共同富裕：国家能力与个体可行能力的均衡[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5(1)：90-100.
[18] BRANDOLINI A. On synthetic indices of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health and income inequalities in France，Germany，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R]. Turin：Centre for Household，Income，Labour and Demographic Economics，2007.
[19] 袁方，史清华. 创业能减少农村返贫吗？——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的实证[J]农村经济，2019(10)：62-69.
[20] 武颖. 政治参与、自我效能与青年幸福感提升研究[J]. 理论与改革，2016(2)：62-65.
[21] 张子豪，谭燕芝. 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感[J]. 金融经济学研究，2018(3)：116-128.
[22] 向运华，姚虹. 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7(2)：116-121.
[23] 李静，王月金. 健康与农民主观福祉的关系分析——基于全国5省(区)1000个农户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2015(10)：80-88.
[24] 张宇争，徐阳，凌巍. 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J]. 统计理论与实践，2024(1)：55-61.
[25] 魏晓艳. 高等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来自CGSS2013-2021的经验证据[J]. 北京社会科学，2023(9)：114-128.

Rural Revitalization Enables Rural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le Ability

KANG Hui

(School of economics，Shanxi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Jinzhong 03061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feasible ability，how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can be effectively connected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bility was clarified，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residents' objective feasible ability on their subjective life satisfaction was discussed. Taking the sample survey data of rural residents in Shanxi Province，the empirical test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multivariate ordered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family per capita income)，ecological livable condition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n life，rural infrastructure)，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bility and physical health status of rural residents' feasible abil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fe satisfaction. Rural civilization conditions (neighborhood atmosphere) and protective security hav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he impact of social opportunities on rural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is uncertain. By constructing a localized feasible ability index system，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well-being effec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provided. The three rural policies should effectively expand the freedom of choice of rural residents，so that the resul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truly transformed into their measurable and perceptible life improvement.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capability of rural residents；life satisfaction；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model